

狂人刘文典

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

章玉政 著

他痛斥蒋介石

认为“大学不是衙门”

他钦佩陈寅恪

推崇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狂人刘文典

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

章玉政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刘文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人刘文典: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/章玉政著. —桂林: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-7-5633-7466-3

I. 狂… II. 章… III. 刘文典(1891~1958)—传记

IV. 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078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 版 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开本: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:26 字数:300 千字 插图:59 幅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8 000 定价: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目 录

序 篇 被忽略的“国学狂人” / 1

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 / 7

第二章 两位“疯”老师 / 24

第三章 追随孙中山 / 43

第四章 变身新青年 / 59

第五章 五四“守夜犬” / 83

第六章 朋友胡适之 / 111

第七章 中西沟通家 / 138

第八章 痛斥蒋介石 / 162

第九章 风雨清华园 / 195

第十章 千里走联大 / 216

第十一章 偶像陈寅恪 / 245

第十二章 恩怨闻一多 / 271

第十三章 国宝级教授 / 295

第十四章 “骂鲁迅”风波 / 318

第十五章 “握手”毛泽东 / 339

第十六章 “眼睛在头顶” / 357

结 篇 并非尾声的尾声 / 385

附录一 刘文典年表 / 390

附录二 参考书目 / 401

后 记 / 405

1 \ “人海罕闻”的初意新 解 一 章

2 \ 客卿制国策 章一第

45 \ 朝圣”游”分西 章二第

84 \ 山中感时旅 章三第

92 \ 平青部良变 章四第

98 \ “失野”“即正 章五第

111 \ 玄面附太照 章六第

861 \ 玄面附太照 章七第

581 \ 玄面附太照 章八第

291 \ 玄面附太照 章九第

815 \ 玄面附太照 章十第

285 \ 玄面附太照 章十一第

155 \ 玄面附太照 章十二第

序篇 被忽略的“国学狂人”

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,或者干脆低声下气,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,更不需要“即日离皖”。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。

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:1928年11月29日,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,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,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文典问话,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。

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,连主席也不愿喊,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:“此事内容复杂,尚有黑幕,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,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。”蒋介石听了,勃然大怒:“你这新学阀横行,不对你撤职查办,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!”

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,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“嗖”地站起来,从容应答:“提起总理,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,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。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,但不等于理性成熟,些微细事,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。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,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!”

结果可想而知。

骂蒋介石的时候,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实际意义上的校长,大小算是个“官”吧。这个“小官”原本是应该对那个“大官”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,即使内心不愿意,表面装装也可以吧。可刘文典不!不仅不愿意装,还要与被国人视为“党国救星”的蒋主席对着干。

刘文典的名言是：“大学不是衙门！”

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？他为何如此之“狂”？

打开“百度”搜索引擎，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：安徽合肥人，祖籍怀宁，原名文骢，字叔雅。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，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，1908年年底赴日本留学。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，后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校任职。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，直至终老。著作有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、《说苑斟补》、《三余札记》等。

寥寥数语，波澜不惊。事实上，迄今为止，除了他生前服务过的安徽大学、云南大学联合出版过一套《刘文典全集》，还有他的儿子刘平章先生编印过一本薄薄的《刘文典传闻轶事》外，关于这位老人的所有故事与评价，似乎都只是零落不齐的“散珠”，难窥全豹。

从零落的故事里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“大师级人物”一生走过的辉煌：早年师承刘师培、章太炎，青年交游胡适之、陈寅恪，中年瞧不起闻一多、沈从文，老年批评过鲁迅、巴金，还曾追随过孙中山，营救过陈独秀，痛骂过蒋介石。解放后，当过国家一级教授，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，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。似乎曾经风光过，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，渐行渐远。

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、历史疏忽，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，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、错谬百出。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？

卷牒之中，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。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、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。是的，关于他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，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耳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。

狂傲，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就拿他“不称主席”的举动来说

吧,即便放在今天,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。1931年12月11日,鲁迅先生以“佩韦”作笔名,在上海“左联”旬刊《十字街头》上发表《知难行难》一文,特意谈到了这件事:

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,因不称“主席”而关了好多天,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,老同乡、旧同事、博士当然是知道的,所以,“我称他主席!”撇开鲁迅借用这件事讥讽胡适的真实用意不说,事情发生三年之后,还能让他想起并引之为据,足见刘文典此举的影响深远。今天的“狂人学者”,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、清华大学的陈丹青、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,似乎就没有刘老先生这么好的运气。于是,名人博客成了“狂人日记”。

“狂”其实是一种气节、一种人格。五千年的文化传承,对于中国文人而言,莫非“气节”二字,正如《孟子》所说,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”。

可能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,刘文典后来的一些选择,让人们在记忆里有意无意地“忽略”了他。1943年春,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文典,因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,于是接受滇南普洱地区盐商的邀请,远赴千里之外的磨黑,“为撰先人墓志”,结果引发清华大学解聘风波。

据说,当初力举辞退刘文典的闻一多,在听说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后,就不止一次地发牢骚:“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,而专收烂货、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。”

闻一多之所以如此动怒,是因为他与刘文典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?还是因为他对刘文典此举“失节”实在鄙睨?近些年,随着一些书信和当事人回忆资料的逐渐浮现,关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,已经日趋明晰。最直接的原因,还是与人们纷纷认为刘文典“气节”失守有一定的关联。

当然,“一文钱难倒英雄汉”,站在今天的立场去看,在当时的境况下,刘

文典做出这种选择,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。自己可以“吃了上顿没下顿”,但总不能老是让妻儿一道跟着忍冻挨饿吧!闻一多讥嘲刘文典应该“度为磨黑盐井人”,其实他本人当时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挂牌刻印卖钱,结果被儿子闻立鹤责问为“发国难财”。

可以想见,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,穷要穷得叮当响,每个人对于“气节”的坚守都是异常看重的。其实,刘文典本人又何尝不是?1948年年末,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,与刘文典素有交情的胡适就曾谋划将他送往美国,并为之找好了“下家”,办好了相关证件,但刘文典的“狂劲”又上来了: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祖国?”

历史与今天,往往只是一张纸的两面。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记忆里,有一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,比如文人的骨气。因此,“狂人”闪亮登场,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“保留节目”。

战国时期,屈大夫洁身自守,遭遇谗言陷害,两番被逐荒蛮之地。但他依然且行且歌,啸傲“天问”,放言古今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最终自沉汨罗。

东晋衰靡,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自弃官印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在他看来,归去也是一种归来,是名利的归去、灵魂的归来。

盛唐气象,李太白寄情诗酒,放浪形骸于天际之间,“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有一次被天子的姨太太喊去写“马屁文章”,他佯装大醉,趁机要求当朝重“宦”高力士为之脱靴。

到了近代,国力衰弱,人心思变,各种“疯言疯语”更是不绝于耳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,臧否人物,报章上每每登出的标题都是《章疯子大发其疯》。有一回,他居然骂到了反对党的头上,第二天,报章上赫然一个大标题:《章疯子居然不疯》。

翻检旧籍,回望历史,这样的“狂人”还有很多很多:嵇康、祢衡、李卓吾、

金圣叹、陈独秀、熊十力、梁漱溟、王芸生、储安平……在岁月的风浪中，这些人或傲然孑立，或慷慨陈言，一心为时代留下无数自由言说、纵论天下的华章，许多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清高自守、不畏权贵、笑骂古今，是这些“狂人”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，正如《论语》里所说，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，进取；狷者，有所不为也”。

面对世俗的责难，面对国事的激荡，这些“狂人”每每抛出惊人言语，或左右乾坤，或推波助澜，或振聋发聩，或喃喃自语，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。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“疯言疯语”的声音存在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世。即便是在国家陆沉、民力艰辛的日子，这些“狂人”的“狂语”，亦为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。这样的人物，确应为历史所铭记。

当然，历史的记忆并不总是公平的。历史能够记住的始终是大忠大奸，抑或是能够“为我所用”的小人物。对于那些曾经散发过生命的火花，但最终又出于各种原因消沉在世俗缝隙里的“中间人物”（张中行语），却似乎只存留于世人模糊的记忆了。

幸运的是，尽管模糊，却还总是有些关于他们的吉光片羽、趣闻轶事，散落在重重泛黄的文章典籍之中。倘若能够静心检点，仔细揣读，就会发现其实在他们的身上，同样有着不应被历史所忘却的精彩与辉煌，亟须“打捞”。

刘文典，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“打捞”的人物。

所以说，历史就像一个经常排错队的老人。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，只是无奈地被拥挤的人群裹挟着，一直往前。综观刘文典的一生，在他孤傲狂狷的深处，其实正寄寓着一种对于独立生命状态的永恒追逐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免又经历着由传统文人向新型文人转变的深切阵痛。

他呼喊过，他失望过，但他还是不曾放弃走向终点的努力。通读刘文典的书信或者手稿，就会发现他经常在信中谈到稿费、借钱等琐碎、细微的日

常生活事宜。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狷介文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现实的折磨。1928年，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书信里，他就谈到了自己“讨生活”的无奈：“弟虽不肖，究竟是个读书人，在那样秽浊的地方，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，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？”这是刘文典的叩问，也是他的自问。这是灵魂的一种自我放逐，也是刘文典作为“狂人”存在的真正价值。

人生，很多时间像是一道虚无缥缈的风景。当你真的走近它时，总会感觉到它似乎没有梦境中那样美丽。可是，俗世中的人们还是喜欢去张望窗外的风景。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，时光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翻开记忆的影集，在那里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，有许多偶然发生的永恒，如同一条河流，尽管不知道远方，却从来没停止过奔腾不息。

主人公刘文典的故事，就是从一条河流开始的……

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

1906年，刘文典的命运与一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。

那就是皖江。“皖江”并不是一条河流正式的名字。浩浩长江，流经安徽域内大约四百一十六公里，因而被人们略显张扬地称为“八百里皖江”。清代安庆府人朱书将皖江的地理范围圈定为安庆府六邑，但民国至今，当地人更愿意将之延伸理解为马鞍山、芜湖、安庆、铜陵、池州，以及滁州、宣城的部分地区。

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看，皖江文化的核心地带大略应在安庆、芜湖两地。刘文典的生平，就与这个文化核心地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甚至可以说，他的人生走向基本是在这里定格的。

“叛逆”陈独秀

说到刘文典与皖江的关系，就不能不提到陈独秀——他们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，算是同乡。

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，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休戚相关。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，陈独秀一登场就是以“叛逆”的角色出现的，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个角色伴随了他的一生，并且影响了无数人，包括刘文典。

且说这位十七岁便考取晚清秀才的年轻人，从小就不安分，家里人本指望他娶妻成家后会“老实”些，没想到他刚当了父亲，就盘算着自费去日本留

学。1901年10月,陈独秀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日语。在那里,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学说,接触到了一部分主张推翻清政府、建立共和国的“励志会”会员。

革命的火种,在青年陈独秀的胸中愈燃愈旺。这把火,很快就在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燃成熊熊烈焰。陈独秀选择的突破点,一是演说,一是办报。

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,大雨滂沱,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激荡的革命豪情。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,他当仁不让,第一个登上讲台,开始了洋洋洒洒的“安徽爱国会演说”,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新要求,并大声发出呼喊:“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,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,再委弃不顾,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!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,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,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,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。”

三天后的《苏报》,报道了这一次演说会的盛况:因“书楼甚窄”,参加大会的人“多立门外而听”,虽被雨淋而不顾,大会始终“众情踊跃,气象万千”。各学堂的爱国学生更是“纷纷告假,多有不上课者”,并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“电阻俄约”。这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,一转眼又成了通缉犯。

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无论晚清政府采取怎样的查禁手段,皖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魂,已经维系在革故鼎新之中。

演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了,避走他乡的陈独秀却并不泄气,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心仪的办报革命。其实早在1902年,他就计划创办《爱国新报》,“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,及对外国争强之道,依时立论,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”¹。1904年年初,陈独秀悄悄潜回安庆,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、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。

后来的现实证明,《安徽俗话报》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传播阵地,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拯救时代。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,就与这份报纸



陈独秀创办的《安徽俗话报》以使安徽青年“通达学问，明白时事”为宗旨。

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说说《安徽俗话报》的概况吧。《安徽俗话报》其实是一本全部以白话文行文的半月刊，三十二开本，每期四十页左右，在安庆创刊，后来迁到芜湖，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。由于芜湖没有印刷厂，所有稿件编好后，寄往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，然后再寄回芜湖向全国发行。

陈独秀自然成为《安徽俗话报》的“大拿”，既是主编，也是主要撰稿人。在创刊号上，陈以“三爱”为笔名，写了篇《开办〈安徽俗话报〉的缘故》，阐述办报的宗旨是“教大家好通达学问，明白时事”。陈独秀后来回忆说：“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，为革新的情感所驱使，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，做《安徽俗话报》，日夜梦想革新大业。”²

在陈的主持下，“呼号爱国救亡”作为《安徽俗话报》的第一要旨，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与执行，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，“表面普及知识，暗中鼓吹革命”。创刊仅半年的时间，发行量就由最初的每期一千份激增至三千份。更为重要

的是,《安徽俗话报》“为安徽地区要求进步的青年所欢迎,思想前进的教师,也把《安徽俗话报》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”³。《安徽俗话报》从创刊到停刊,历时一年半,对安徽青年的思想转变,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正在合肥读书学习的刘文典,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与熏陶,逐渐立志要讲洋务。“陈独秀等人创办领导的《安徽俗话报》、岳王会,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、华兴会等,都对刘文典萌发反帝反清、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。”⁴

两年后,刘文典毅然踏上了前往芜湖安徽公学求学的道路。

安徽公学

明清以来,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。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。

1897年的冬天,刚刚乡试落第的陈独秀新婚燕尔,倒也未觉寒意。此时,他刚刚“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”,正激情万丈,将眼光投放到书窗外的世界,开始了人生第一篇宏文的写作。

在这篇《扬子江形势论略》里,陈独秀较早且敏锐地谈到了江城芜湖的重要:“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,县城距沿江五里,南有青戈直贯皖南,西有裕溪可达皖北,故先主谓孙权曰:‘江东形势,先有建业,次有芜湖,盖亦滨江要冲也。’”陈独秀此后的生活,注定要与芜湖产生不可割裂的关联。

《安徽俗话报》的创办,就是陈独秀在芜湖投下的一颗“探路石”。在陈独秀的引领下,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。但由于演说、办报风险均较大,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,选择了开办学校,从发展教育、启迪民智入手,进行深入的思想传播。在此之中,安徽公学是较为突出的一个。

安徽公学的创办人李光炯,名德膏,安徽枞阳人。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

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,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:中国要想转弱为强,局部改良不行,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,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。1904年2月,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,接纳安徽在湘子弟,聘请革命党人黄兴、赵声、张继等人为教员。

陈独秀很快关注到了这所学校。1904年4月30日,《安徽俗话报》第二期问世,就有一篇专为安徽旅湘公学刊发的招生消息:“有本省志士李德膏君,在湖南同乡官商中,筹集经费,稟请湖南巡抚,创设安徽旅湘公学,专收安徽人,学习普通各学。前月在省城,遍贴招贴,招收学生。学中学费、伙费,每年只收四十千文,已于本月初一开学。听说学规功课,样样都不错,我想安徽有志求学的青年,狠(很)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呢。”褒奖之意,溢于言表。

不料,好景不长。1904年10月,教员黄兴参与组建华兴会,密谋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行礼之际,引爆炸药,炸死聚集在长沙万寿宫玉皇殿行礼的湖南文武官员。不意起义消息提前走漏,黄兴等人被控“结党谋逆”。因为人事牵连,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,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。

陈独秀在安徽旅湘公学迁至芜湖的决策中,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,目前说法不一。中共早期党员、陈独秀的“铁杆粉丝”高语罕认为,“这个学校从湖南迁来的,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,就是陈独秀氏”⁵。不管事实是否如此,1904年年底,安徽旅湘公学正式迁往芜湖,更名为“公立安徽公学堂”,校址设在芜湖二街三圣坊。

没多久,《安徽俗话报》第十七期上登出了安徽公学的招生广告:

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,在长沙开办一载,颇著成效。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,跋涉维艰,兹应本省绅商之劝,改移本省。并稟拨常年巨款,益加扩张,广聘海内名家,教授伦理、国文、英文、算学、理化、历史、地理、体操、唱歌、图画等科。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,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。学额:本省百名,外省二十名。

学费：本省人不制取，外省人每月收英洋二元。

膳金：无论本省外籍，每月均收制钱二千文。

入学年龄自十五岁起，至二十二岁止，三年毕业。

兹定于乙巳年（1905年）二月内开学，有志入学者，望于二月初十日前偕保人或携介绍信来本公学报名，听候考验。必须身体健康，心地诚朴，志趣远大，国文通顺者，方为合格。

安徽公学广聘的“海内名家”，包括陶成章、刘师培、苏曼殊、谢无量、柏文蔚、江彤侯、张伯纯、金天翮、胡渭清、潘赞化等，陈独秀亦于1905年起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。一时间，名流汇集。

安徽公学，吸引了省内外年轻学子的眼光。

“大海里尝了一滴水”

该说说刘文典了。

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，罕见记载。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，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，父亲刘南田，思想相对比较开明。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，兄弟排行第三，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“刘三爷”。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，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、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，两兄弟感情甚笃，来往密切。

可惜，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。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，突然发病，撒手西去。刘文典兄弟姐妹一共七人，五男两女，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。母亲直到抗战爆发前才去世，晚年长期住在安庆，勤俭度日，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了。

刘文典自幼聪慧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，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，做个“洋买办”，光宗耀祖。幼年时代，刘文典除